

简论周恩来经济思想的基本方法

王毅武

周恩来经济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中经济理论方面的重要内容。本文在深入研究周恩来经济思想的基础上,就周恩来经济思想的基本方法进行了概括,认为注重实际,尊重科学;周到细致,讲求联系;把握关键,总揽全局是周恩来观察、思考和处理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亦是周恩来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具体化。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则是周恩来经济思想的基本方法,对于准确、贴切、客观地认识周恩来的经济思想及其发展过程,是极为必要和重要的。

周恩来的经济思想既丰富又实际,既科学又具体,几乎论及经济理论的各个方面和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颇为完整的经济思想方法体系。

总的来说,周恩来经济思想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他观察、思考和处理经济问题的基本原则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灵魂和精髓。

一、注重实际,尊重科学

纵观周恩来的经济论著以及考察他指导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可以看出,求实、求真的思想和鲜明的态度是其经济思想方法的基点。

早在1922年周恩来选择了“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之时,就主张讲求实际运动,表达了“我求真的心又极盛”的毕生誓言^①。他始终注重实际,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客观规律,既不当教条主义者,也不当空想主义者。

注重实际,尊重科学,首先要吃透中国的国情。对此,周恩来不仅得出了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多、经济文化落后、发展不平衡等一般性结论,而且认为封建性很大是中国的重要特点,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内来,“尤其在党员成份上,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五。因此,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有大大发展的可能。”“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鉴于这种实际情况,周恩来早在1928年就明确提出要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②联系我们在革命和建设反复出现的“左”的倾向,周恩来的认识既是客观的,也是富有远见的,关键就在于他思想方法的正确。周

恩来认为,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所处生产方式的个体性、零散性和落后性,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而往往带有片面性、主观性和动摇性。虽然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中国的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削,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但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有着本质不同,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由于其经济地位而缺乏远大的政治目标,对于革命斗争的复杂性、长期性、曲折性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往往容易采取过激、过左的政策和行动。而当“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狂热性”^⑧在中央领导机关发生时,就会产生“左”倾错误。这种错误,在革命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可能发生拼命情绪和盲动主义,在革命形势较顺利的情况下可能产生幻想,出现急躁情绪与冒进行为。可见,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多次制止经济建设方面的急躁冒进是有其哲学思想基础的,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与把握,是注重实际,尊重科学的必然。

注重实际,尊重科学,特别要深入群众,把握实践。周恩来指出,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群众实践活动是一切真知的唯一源泉。在我党历史上,周恩来第一个明确使用了“群众路线”这一概念,他在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写道:“关于筹款工作,亦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⑨周恩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是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群众是推进经济建设事业发展的主体。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民造福,不动员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只能是一种幻想。因此,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他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周恩来始终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深入生活,贴近实践,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既能及时解决人民群众的眼前问题,又能切实把握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这一切与他注重实际,尊重科学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分不开的。

注重实际,尊重科学,必须反对并根治官僚主义。1963年5月,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反对官僚主义》的专题报告,指出:“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官僚主义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一百年来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官僚主义更是有深远的影响。”^⑩他把官僚主义归纳为20种,究其实质,就是不了解情况,不调查研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周恩来还严肃地警告说:“凡是机关大而人多的地方,必定要出官僚主义,这几乎成为规律了”。“因为那个机关本来不需要那么大,机构搞得那么臃肿,一定会有很多人不办事情,吵吵嚷嚷,很多事情在那里兜圈子,办不出去。”^⑪1973年,他在一次会议上再次批评道:我们的事情之所以难办,就是层次太多,又不敢负责。机构不改革不行,权力一定要下放,领导者要懂行,官僚主义要不得。“必须看到,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⑫

注重实际,尊重科学,就要正视自己。周恩来要求我们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必须正视两种事实,既承认世界文化与科技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又承认我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经济的差距。“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能搞。”^⑬外国的东西,并不都是坏的,先进的科学技术、高度的物质文明、优秀的文化遗产、科学的经济管理,都应该批判地学习、借鉴。只有敢于正视自己民族文化的短处与经济发展的差距,才有可能进步,才有可能腾飞。否则,自力更生、勤俭建国也会出现偏差。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周恩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眼光始终聚焦于实际,集中精力于经济,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并特别强调“要重视科学,重视知识,重视实践。马列主义就是从社会实践中进行科学分析得来的。”^⑭

注重实际,尊重科学,一定要“认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指导经济工作。”^⑮周恩来认为,社会发展包括经济建设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些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你喜

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它总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⑩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反复要求“克服侥幸心理、依赖观念、畏难思想和急躁情绪”。并强调:“任何经济建设总会有些未被认识的规律和未被认识的领域。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不断地去认识,认识了一个,解决一个,还有新的未被认识。”^⑪周恩来一向反对不顾现实可能与具体条件去干那些没有根据和实在办不到的事情。他认为,按客观规律办事,也是实事求是,而且是实事求是的极为重要的内容与要求。为此,周恩来在指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特别注意矛盾的特殊性,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要“找出此时此地的特点”,并“要时时注视形势的发展”,^⑫“要善于估计情况,运用策略,创造各种各样的工作方法”^⑬。

注重实际,尊重科学,关键在于理论联系实际。周恩来指出,我们不能把理论当作教条,如果不顾实际情况,把理论拿来乱套一阵,总是要失败的。他认为,搞经济建设也是要学习理论的,但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理论,目的是要用它进一步指导实践。他在政府的各项工作中始终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把调查研究看作是联系实际的起点,把尊重客观规律视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枢纽,从而完整地体现了他注重实际,尊重科学的经济思想方法。

二、周到细致,讲求联系

周恩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始终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原则去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他认为“事物总是有矛盾的,有矛盾就能促进事物发展,如果停止发展,就会灭亡。”^⑭因此,在认识和处理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谨慎,周到细致。他说:“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下去调查,要敢于正视困难,解决困难。一个困难问题解决了,新的困难问题又来了。共产党人就是为不断克服困难,继续前进而存在的。畏难苟安,不是共产党的品质。”^⑮

周到细致,讲求联系,要尊重客观事实,认真负责。周恩来认为,经办一切事情,无论大小,都必须本着对党的事业、对人民的事业极端负责的革命精神,既不盲从,也不文过饰非。在他看来,事实不但要真,而且要准,这是人们能否正确思维的基础。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尤其要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一则一,二则二,务实求是,周到细致,万万不可感情用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展开后不久,周恩来就体察到了经济建设中开始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他不怕被扣上“右倾保守”帽子的风险,大胆纠正种种急躁冒进现象与行为,并严肃告诫国务院各部: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要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最重要的是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急躁冒进的苗头需要注意。他特别指出:“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⑯一定要坚持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只有周到细致,头脑清醒,对经济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才可能不为“气候”或“风向”所左右,按客观规律办事。

周到细致,讲求联系,必须有比较,有鉴别。一切事物都因矛盾的特殊性而具有自己的特点,从而构成此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要周到细致,就要真正认识事物的本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周恩来认为在经济建设中,“两利相权哪个重,两害相权哪个轻,要比较。”^⑰这是周恩来在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时进行决策的一个重要方法。因为“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

题”⁷⁰。事物总是发展的，有比较有鉴别，认识才能正确。在谈到中美贸易时，周恩来说：“中美两国是大国，难道一点贸易往来不能发展吗？不可能嘛！”“可能发展会慢一些，但这可靠。所以，必须找到合适的方法。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怎么找到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方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⁷¹在周恩来看来，“研究对方”，“了解对方”亦是“找到合适的方法”的方法，亦即是周到细致重要的方法。在强调要学习外国的长处时，周恩来批评某些人说：“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⁷²因为这种认识既不周到，也不细致，因而是片面的。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和目标如何周到细致，周恩来提出要注意四个方面：一是必须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我们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经验，对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必须加以比较分析。正确地总结经验，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建设的信心。”⁷³二是必须对现实有恰当的估计。他认为，“要反复地调查研究，才能得出恰当的估计。”“必须根据基本数据，做出必要的计算。搞经济工作，钻到数字里去拔不出来是不对的，不研究数据也是不对的。”⁷⁴三是必须瞻前顾后，有一个远期的奋斗目标。四是必须抓住中国的特点。可以说，这四个方面既周到细致，又互相联系，体现了周恩来“立足现实，瞻望前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精神。

周到细致，讲求联系，要注重辩证法。在指导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周恩来娴熟灵活地运用唯物辩证法于经济工作之中，堪称大师。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曾精辟地分析过军事斗争与经济建设等重要问题的辩证关系。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就新民主主义经济与旧民主主义经济、工业与商业、城乡关系、工农利益、劳资问题等“毛主席所提出来的四面八方的问题”进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阐述，其主张得到了“有力的拥护和实现。”⁷⁵1949年12月，新中国刚刚诞生两个多月，周恩来在对各地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的讲话中提出：“盲目不是科学的态度，不能建设新国家”，并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发展史上首次辩证地论述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工商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上下关系，确立了“六种关系”的指导性原则。如“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实行城乡互助，互通有无，国家建设“以国内力量为主，即自力更生为主”；“工业和商业比较，当然是以工业为主”，引导商业为工农业与流通和人民生活服务；“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了恢复和发展国家的经济，需要私人资本的帮助和合作”；在私人企业中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⁷⁶如此等等关于经济关系的辩证阐述，在周恩来的讲话、报告、批示、文章中比比皆是，充满了活生生的辩证法。50年代中后期，“多、快、好、省”的口号提出后，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左”的影响，人们往往追求“多”和“快”，忽视“好”与“省”。周恩来则强调“多、快、好、省”是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某些方面，而忽视或排斥另一些方面。他认为，讲“多”和“快”不能离开“好”与“省”，因为它们是对子，是对立面的统一。搞生产，不能只强调产量，不讲求质量。质量需要数量来维持，没有一定的数量不行。同时，数量也需要一定的质量来维持，生产的数量不少，但质量不合格，许多是次品、废品、浪费了人力、物力，数量越多，浪费越大，这就不是效益，而是负效益。一味地贪多求快，不计成本，不求质量，不要好和省，最终是欲速不达，劳民伤财。实践证明，周恩来的认识是辩证的。对此，毛泽东也说过，1958年大办钢铁，几个大办，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后来，万马齐喑，一马也半死了。今后再不要闹这个笑话了。60年代初，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关了很多厂，拆了很多“庙”，精简了很多入，有些同志想不通。周恩来则深入分析了调整与发展的辩证法，他在《认清形势，掌握主动》中说：“我们现在调整工业的政策是采取关厂、并厂、缩小规模、改变任务、转业这样五个办法。全国六万多个工业企业，可能关掉一半以上。这好象是消极的，实际上，这样就可以把原材料、电力、煤

炭集中到消耗少、质量好、品种多、成本低、劳动生产率高的工厂去使用。从全国来看，一个时候产量会低一些，但最后会使工业品的数量多起来，质量好起来，有一部分还可以增加出口。当然，这要经过调整，要有一个过程。”又说，我们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保证市场，整顿秩序，缩短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战线，相应地缩短其他方面的战线，减少城市人口，减少职工，达到增加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目的。“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针，是一个经过调整、改组，然后前进的方针。”^⑧在如何正确处理尖端科技、尖端武器与基础科学、基础工业的关系问题上，周恩来运用唯物辩证法生动而又深刻地将其表述为“两个拳头，一个屁股”。他说，尖端科技和尖端武器是“两个拳头”，基础科学和基础工业是“一个屁股”。基础上不去，尖端也上不去。只有基础搞好了，“屁股坐稳了，两个拳头方能打出去。”同时，又要把尖端搞上去，以推动基础工业的发展，二者“互相促进，不断转化。”他特别强调：“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⑨周恩来的经济辩证思想一般都是贯穿、融合、渗透于对经济工作的具体指导之中，注重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反对认识的片面性与孤立性；注重事物的发展与变化，反对认识的凝固化与机械化；注重从矛盾的对立关系中把握统一，反对认识的极端化；注重矛盾的特殊性，反对认识的简单化和雷同化。他特别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刮风”，也反对“发热”。他认为，人们一旦违背了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就会摆不正事物发展的矛盾关系，认识不到事物发展的趋势，易于出现随风跑和头脑发热。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⑩于是，自然就会把握不住方面。“我们搞经济工作要看到问题的本质”^⑪，否则，抓不到要害。

周到细致，讲求联系，还要准备随时修正错误。在周恩来看来，之所以出现错误，就在于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不周到，不细致，对矛盾的联系及其趋势同样认识不周到，不细致。他深刻指出：在科学问题上，共产党应该服从真理。共产党不服从真理，那就不是共产党。如果共产党不服从真理，共产党会被推翻的。要有这个勇气和信心，对于凡是不合真理的，我们就承认是错误的，这就解决问题了。要把我们共产党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贯彻到底。你的道理站不住，你就要修正它。一定要懂得我们是常常会犯错误的，我们的长处就是能够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敢于承认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不断改进。

三、把握关键，总揽全局

在指导和组织实施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周恩来由于他的领导地位与工作性质所决定，一向强调从整体或全局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他认为我国的建设事业，特别是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各方面必须协调发展，统筹安排。在总揽全局的同时，又要把握关键，抓住重点，有点有面有片，“点、面、片相结合”，^⑫既要反对只看到局部和眼前利益，忽视或不顾全局和整体的“分散主义”，也要反对没有重点和抓不住关键的“齐头并进”与“一步登天”。

把握关键，总揽全局，要广看兼听，掌握情况。周恩来曾指出：今后我们国家决定一个政策，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凡是关系大的，都应该多讨论，多商榷。分析问题和处理事情，都要客观、辩证，要调查研究，广看兼听。无论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政府成员，还有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对于政府的工作，“凡有所见，应该时常提醒我们，使问题研究得更全面，讨论得更详尽，设想得更周到，这对于事情总是有好处的。”他还认为，“讨论问题，应当提倡平等的争论，

不要认为领导者的意见就百分之百的正确。其实,有些问题,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年青的同志,往往有更好的见解。他们接触实际多,框框少,所以有些意见更能切中要害。”“谁的意见对,我们就按谁的意见办”。“要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⑧周恩来还强调,要“提倡互相切磋,造成民主气氛。”“群众有智慧,问题是你要使这些智慧发挥出来,集中起来。所谓多谋善断,‘多谋’来自民主,‘断’就是集中。”^⑨多谋善断的基础在于观察的客观性,即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多种多样关系的全部总和。对任何事物都必须进行综合的、整体的考察,决不能只看局部,不看整体;只看某一方面,忽视其他方面。对此,周恩来曾有一段生动的阐述:“一个人生着两个耳朵,能听话;生着两只眼睛,能看东西;生着两个鼻孔,能闻味。听话,能听正面的,也能听反面的;看颜色,能看白的,也能看黑的;闻味,能闻香的,也能闻臭的。所以,人体的机能也是合乎辩证规律的。我们必须听各方面的意见,辨别是非”。“一个人坐在房子里孤陋寡闻,这样不行”。“即使自己有很多对的意见,但是还要听人家的意见,把人家的好意见吸取过来,思想才能更发展,辩证法就讲矛盾的统一,只有通过争辩,才能发现更多的真理。”^⑩周恩来特别赞赏兼听则明。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期间,针对“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他从“讲真话”和“听真话”两方面说明了“真”的重要性“要提倡讲真话,即使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代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⑪周恩来提倡的,也是他身体力行的,这种风范在周恩来经济思想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把握关键,总揽全局,必须正确处理重点与全面的关系。1949年12月,周恩来在部署全国经济工作时指出:“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并强调,必须重视重工业的发展。显然,周恩来把农业的恢复和重工业的发展看作是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点与关键。同时,他又说:“重视重工业,但决不能把它当作唯一的工业”,“必须有整体观念,要在总的财经计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认识自己的方向,有重点有计划地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⑫要注意一种偏向,“就是某些重要工作过分突出,以致同有关方面脱节。”他举例说:“我们强调重点建设,并不是说可以孤立地发展重点,而不要全面安排;我们要求全面安排,也不是说可以齐头并进,而不要保证重点建设。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安排工作的时候,必须把重点和全面很好地结合起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重视了中央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地方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我们重视了内地建设事业的发展,而对沿海地区建设事业的发展注意得不够。今后,我们应该经常地注意调整上述的关系,避免发生片面性。”^⑬周恩来在论述四化建设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时,同样运用的是把握关键,总揽全局的方法。

把握关键,总揽全局,应该有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可以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也可以是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针。1952年底,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一结束,周恩来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亲自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并向全国人民首次正式提出了在我国“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战略任务^⑭。此后,这一战略任务一再被强调,并不断在实践中得到充实和发展。当我国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后,周恩来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深刻阐述了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重要方针。如要重工业,也要人民;按农、轻、重秩序安排生产;摆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的位置等。

(下转第88页)

总之,作家双重人格的形成,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外部的因素和内部的因素,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境遇,职业的特点和个人的心理品质等等交织在一起。目前,我们能作到的还仅仅是分析作家的双重人格这一心理现象本身,仅仅是罗列些产生这种双重人格的直接的和间接的原因。要想使课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还需要更多的实证材料和更充分的理论准备。

注 释:

- ①④ 参见荣格《心理类型学》中译本,华岳文艺出版社。
② 参见(美)库尔特·辛格《海明威传》中译本,浙江文艺出版社。
③⑥ 参见(瑞典)拉格列克朗斯《斯特林堡》中译本,外国文学出版社。
⑤⑦⑨ 参见(法国)莫洛阿《乔治·桑传》中译本,湖南文艺出版社。
⑧ 参见(法国)莫洛阿《雨果传》中译本,湖南文艺出版社。
⑩ (苏联)亚·列·托尔斯泰娅:《父亲》,上海译文出版社,第455页。有的本子这句话译作:“探索啊,不断地探索。”
⑪ 歌德:《浮士德》中译本,复旦大学出版社,第667—668页。

(责任编辑 张炳煌)

(上接第54页)

此外,他还对经济建设中的需要和可能、生产和基建、经济和财政、积累和消费、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等问题,作了从全局着眼而又有侧重的阐述。周恩来认为,无论是从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我们主观认识出发,考虑中国的经济建设都应该从全局出发,把全局性和整体观念作为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他指出:在人们日常的思维中,“大多是发挥自己所着重部分,不能综合全局来看问题。任何经济建设总会有些未被认识的规律和未被认识的领域”,“自然界中未被认识的事物多过人们已经认识的。”^⑧正因为整体性与全局性思维能够帮助人们深化认识,不断地走向自由王国,符合中国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所以周恩来一再强调:“观察问题总要和全局联系起来”,要有“国家的观点、全民的观点”^⑨“经济建设必须根据各国的情况,制定一条正确的路线”^⑩。

应该说,周恩来经济思想的研究方法是丰富的,多侧面的,不只是上述几个方面。仅就上述几个主要方面而言,也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有机整体。我们不应该机械地割裂周恩来经济思想的方法,进行这种概括,不过是在研究周恩来经济思想的过程中,为了加深理解和把握精神实质。总之,周恩来经济思想的方法,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⑪。

注 释:

- ① 《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
②③④⑬⑭⑮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174、36、270、110、329—330页。
⑤⑥⑦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8、420、422、413、434、368、314、190、314、1—14、411、413、438、349、132、434页。
⑧⑩⑪ 《周恩来的思维艺术》,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2、303、247页。
⑥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0—501、646、641、641、517、11、332、593、27、281—282、592、648、251页。
⑬⑭ 《周恩来的管理艺术》,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109页。

(责任编辑 邹惠卿)